

纸上老武汉 画中众生缘

——读萧继石《老武汉民俗画卷》
张福臣

2026年2月，五卷本《老武汉民俗画卷》趁着北方小年的喜庆，落在我手心。我用手拂过书页，书页中散发出老行当、老字号、老童谣、老风俗的味道。这些画面出自画家萧继石君之手。从上个世纪末到当下，萧继石历时二十春秋编织着老武汉的美梦，如今美梦成真，由崇文书局于2026年2月出版。

我与萧继石相识已有十几个春秋，交往始于画与书之间的“情感纠葛”。2009年，我调到武汉大学出版社工作，第一时间向他约稿，后责编出版了他的谈艺录散文集《淋湿的幽默》。书中，他写到了自己成为画家的起点：父亲是乡亲们不可或缺的教师先生，写得一手好字，每逢春节，四邻都来请他写春联。有乡亲提着母鸡来求画钟馗，父亲居然无师自通地画了出来。“那我也来学一学怎么样？渐渐地，我也迷上了绘画。”这个朴素的起点，奠定了萧继石一生的艺术底色——不尚玄谈，扎根民间。

《老武汉民俗画卷》最可贵之处，在于画家始终以“小人物”为视角，在民生细节中见出大爱。翻开“老行当”一卷，第一眼就看到剃头挑子。“一头是炭火炉子，小铜盆，一头是带抽斗的油漆凳子。剃头匠挑着这行头走街串巷……”老屋前，花树下，放下挑子，拿起剃刀，洗、剪、刮，一袋烟工夫将客人收拾得体面光亮。一幅热爱生活、生动形象的人间烟火画面让人过眼不忘。

如果说剃头匠展现了市井的从容，那么翻过这一页，你会看见一群排着长队、肩挑背扛的搬运工走过来。旧时武汉，大小码头星罗棋布。船到码头上下货物，全靠搬运工人肩挑背扛。他们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“苦力”，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泥——他们身上既凝聚着苦难，也凝聚着人性的闪光。一幅又一幅劳苦大众互助互爱的画面留存在他脑中，也如花儿般绽放，成为每一幅画的精髓。

不仅是这些传统行当，就连那些容易被遗忘的普通人，也被他郑重地请进了画卷。“武汉街头的清晨，会看见有人手推木轱辘垃圾车来来往往，发出‘嘎吱、嘎吱’声。他们是城市的‘美容师’。这些清洁工由政府统一雇雇，统一着马甲。当时这种垃圾马车，算得上一流的豪华装备了。”

我每天清晨准时听到清洁工扫地的声音，拖垃圾的汽车风雨无阻地从门前走过。萧继石住在高楼里，看不见拖垃圾的汽车，听不见扫地的声音，但他早就把清洁工装在了心里，握起画笔，将这些旧时的清洁工也融入了今天的画卷中。

萧继石对这座城市的深情，还体现在他对老字号的珍视上。萧继石爱书、爱读书、爱书店。我也离不开书，买书、卖书、读书、编书、写书，“五书俱全”。翻开老字号这一卷，我终于看见了“生活书店”的全貌。“1935年，汉口交通路中段一栋建筑墙面挂起了‘生活书店’的招牌，这是上海生活书店在外地开设的第一家分店。”萧继石用爱书的心、爱画的手绘出生活中的书店，书店长在在了汉口的交通路，长在在了老武汉风俗画卷中的老字号里。

老字号里还有一个老地方值得“画说”——“老汉口人称民众乐园是汉口的戏窝子”。这座始建于1919年的建筑，最初名叫新市场，是汉口最早的商业娱乐综合体，曾易名大世界、人民俱乐部。有首民谣如此吟唱：“一进新市场，真是见洋广；京戏、汉戏、花鼓戏一场又一场；这里玩把戏，那里放电影，楼上楼下好几层，到处人挤人……”萧继石爱上民众乐园的所有，也画下了民众乐园的所有。

走出戏窝子，老武汉的另一重记忆，则藏在街头巷尾的吃食里。炸面窝、热干面、三鲜豆皮、糊米酒、糯米包油条……这些武汉人日常的小吃，被萧继石一一定格在画纸上，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乡愁。他是喝洪湖水长大的，为人如洪湖之莲，出淤泥而不染，那份对荷塘的情感自然也流入笔端。画卷中有一幅荷塘三宝图——取嫩莲子、菱角、藕带，配上少许青红椒丁，爆炒后入口娇柔清甜。萧继石画出了它的鲜美，却将味道留作空白，让观众在想象中咀嚼。而另一幅鳊鱼图则别有深情。鳊与桂、贵谐音，是丹青妙笔下的常客。“菜肴伴我声朗朗”——萧继石画的是鱼，更是家的幸福味道，是对妻子说不尽的深情。至此，老武汉的滋味，不仅在舌尖，更在画中、在心底。

看过萧继石的196幅民俗画卷，成千上万个小人物的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的所有众生相永远刻在我记忆里。萧继石画风质朴动人，行文亦庄亦谐，点到为止，没有故弄玄虚，没有虚张声势。低调的画家用心中的大爱绘就千千万万个小人物的民生。小人物的众生相，其实就是一个大写的“人”。画家心中有爱，才能出好作品。

（作者系出版人、作家）

不炫技，最深情

——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声音美学
张文昭

在电影市场整体承压的背景下，一部小成本制作的潮汕方言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悄然走红，书写了票房与口碑的双重神话。不同于主流电影的宏大叙事，也不同于过往方言乡土电影的“奇观”式展演——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以清隽的笔触、平淡的叙事、近乎纪录片般的冷静，呈现跨越半世纪江海两端、于一封封“侨批”串联起的温情故事。

有趣的是，任何技术分析在这部佳作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。全员非科班团队、去技术化的平铺直叙，给予影片一种朴素而粗粝的质感。它不禁让我想起一些艺术影片，同样小制作、聚焦生活细节，偏不把戏做满，却总在不动声色间，撬动人性中最隐而不发的共性情感。

音乐同样如此，克制又精确。它绝非作为情感的“扩音器”存在，反倒像一位沉默寡言的旁白，连接起时代罅隙中小人物命运的起起落落。影片对声音的用心，首先就藏在对“环境音”的偏爱与打磨里。该片声音设计团队刻意模糊了“配乐”与“音效”的边界，置入大量生活景致的白噪音，营造一种满是烟火与人情的声音景观：阿嬷在老厝天井里晒腌腊时的竹匾摩擦的沙声、功夫茶汤腾冒气的咕嘟声，以及老屋里潮剧录音的依稀回响，总在不经意间闯入观众耳鼓。这些声音构成了影片音响“底噪”，一种扎根潮汕乡土的、充满生命力与音乐性的呼吸感。

电影配乐同样不急不躁，娓娓道来。“90后”汕头作曲家吴泽华包揽了影片中二十余首原声音乐。吴泽华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，拥有学院派与潮汕本土的双重音乐素养。此前，他已参与《满江红》等大片的音乐创作，并与导演蓝鸿春合作《色，我一定行的》《带你去见我妈》两部作品。虽说年纪尚轻，吴泽华的配乐显得从容老到。他没有触碰前些年影视圈流行的那套宏大交响，而是转向更简约轻盈的室内乐编制与电子氛围音乐。在台词的间隙，我们间或听到极简的钢琴旋律、长线条的弦乐与温暖的木管，毫不抢戏，音量往往很低，仿佛

不炫技，最深情

——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声音美学
张文昭

贴着地面行走。

虽然吴泽华刻意藏起锋芒、收敛技法，仍有不少段落出人意料，让人耳目一新。男主角木生在女主谢南枝的唐人街旅社开设私学，聘侨批先生给无根的孩子讲授中文。伴随着老唐明媚的春光和咿呀呀的学语，是宛若八音盒般俏皮童趣的乐思汩汩流淌。南枝本不同意开私学的冒险行径，但画面一转，是孩子们求知灼灼的眼神，和租客们无声的坚持，南枝第一次心软——这也成为改写故事走向的第一处伏笔。吴泽华为南枝、木生和淑柔等主要角色分别写了专属的音乐旋律——这无疑学院派的经典路数！留守潮汕，独自拉扯三个孩子的淑柔的音乐主题是被饱满弦乐组包裹的、回旋的钢琴旋律，如蒲苇般坚韧；木生的主题基于低音区不断游弋的三和弦，宿命跌宕，他始终仰着头，背负着对家庭、对身边潮汕同乡的深情默然前行；南枝的主题仅由钢琴承担，高音区乐音如珠串一颗颗落下，清冷而独立，以最温柔坚持成长为庇护一方的南枝先生。

如果说吴泽华的配乐构成了电影无言的情感骨架，那音乐总监李奕瀚的乡土美学，为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扎下了文化的根。李奕瀚来自汕头南澳岛，枕着海风听潮剧入眠是他最真实的童年记忆。2008年，以“海洋民谣”为基调的“玩具船长”乐队应运而生。在李奕瀚的率领下，“玩具船长”坚持唱着在潮汕也算小众的南澳岛话，融合了方言民谣与雷鬼元素，开创出轻松又怀旧的“海洋”风格。

影片的片尾曲《一封侨批》并非电影的原创歌曲。该曲最早收录于“玩具船长”乐队专辑《青春照相馆》，已等待它的伯乐十年有余。“等待”侨批，构成那个年代无数潮汕家庭最浪漫也最磋磨的日常——“等待”，恰是该片的经典母题。李奕瀚最初的灵感来自自家尘封的家书，并借鉴了潮汕歌仔戏的元素。“无钱无米无奈何，背个包袱过暹罗”。朴素粗粝的方言唱腔，似乎有意游弋在规整节奏之外，勾勒出潮汕人“下南洋”辛勤打工的集体群像。一段終了，扬琴与高胡的对答，缠

绵而悠长，如夫妻二人跨越山海、未能言尽的眷恋。镜头摇远，最终定格在木生生前于唐人街拉三轮的瞬间，仍是少年模样。

李奕瀚的插曲不多，但不乏惊艳之笔。《海风的旅程》像一只轻柔平静的漂流瓶，唱词仅有重复的“lai lai”（潮汕话“回家”之意）。木生终于攒够钱、准备归乡的前夜，与邻船的劫匪缠斗，坠入水中，无声无息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。《置家之歌》，全片唯一一曲非潮汕语的原声插曲，出自电影最动人的转场：南枝去侨批局为木生的讨告，却撞见千千万万个为家人讨生计的“木生”。南洋众生相与木生生前寄信的笑容反复交织，终于促使南枝守护秘密，甘愿成为淑柔一家的倚靠。歌手“好命小张”用轻柔的粤语气声吟唱苦难与坚守，大提琴与钢琴相互攀援，映着摇曳火光下南枝清冷又温暖的面庞。《月下煮茶》中，李奕瀚用了北京“小邓丽君”陈佳演绎潮汕话——找非潮汕歌手来唱潮汕话，正是李奕瀚的惯用手法。圆润的中音区反复呢喃：“心在何处少年家，繁华到底落谁家。”终于拾回记忆的老年南枝对着淑柔展颜一笑，两位守望半生的女性相互依偎，无声倾诉钦佩与恩义。在我看来，《置家之歌》与《月下煮茶》恰恰构成两位女主角的隔空对话。

这部影片的配乐，像一封写给岁月的情书：纸短情长，满载未能宣之于口的中音浪漫。说到底，好的电影配乐从不是作曲家炫技的秀场，而是一方水土、一群人、一种活法的声音实践。李奕瀚的选择亦别有意味：并未沿用类似影片偏重胡琴、琵琶等传统民乐套路，而是采用钢琴与弦乐。这种不那么“民俗”的处理，反倒更贴合侨乡那股既土又洋的气质。阿嬷的半生守望、侨批的山海情义、潮汕的烟火日常……私人经验与公共记忆在此交汇、叠合，氲成一幅辽阔的时代画卷。诚然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音乐风格仍显单一，但正是这份“轻”与“空”，让质朴粗粝的本色得以浮现。人生总有遗憾，而寂寂无闻之辈，都是平凡岁月中的大英雄。

（作者系音乐人类学者）

挖一口文学之“井”

王芸

起初只是按照惯性去写，拾取自己感兴趣的素材。一个人的审美取向是相对固定的，感兴趣的点趋同，于是有了越来越多同类主题的作品，一个想法也慢慢明晰——这是我可以深挖的一口“井”。这就是我创作关涉非遗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作品的缘起。而今，这些作品以散文集《纸上万物浮现如初》、小说集《与孔雀说话》、长篇小说《对花》《纸镇》、儿童文学《会飞的板凳龙》《生命之树》等形式集中呈现。

这类写作，通常不从作者日常生活经验中生长出来，所涉多属“陌生之地”，需要在创作前进行田野调查、采风、采访，并研读相关资料。十多年来，我写了不少非遗题材：南丰傩舞、景德镇陶瓷制作技艺、吉州窑木叶天目盏、乐平古戏台筑造技艺……每一次书写，于我都是“扫盲”过程，一次次打认知知的“盲区”。

虽然对传统文化有着“由来已久”的好感，但必须承认，我们的民族文化实在是浩繁、丰富、复杂，而每个人的精力、时间有限，眼界也有限，一旦深入进去，就会发现到处是“盲区”，以往了解的可能只是皮毛表象，未抵达其内核。于是，不仅需要采风采访，阅读大量的资料，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，看到表象之下的文化根脉，写时才能不滞不涩、不干巴不僵硬，才能将之写“活”来，进入文学性和个性兼具的表达。同时，借助一次次书写，我也不断地进入新的领域，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。

中华传统文化植根于我们的农耕文明，是在千百年前的民间生活土壤、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，经过漫长时间的发育，不断演变，那些经过时间长久冲刷，还能留存至今的优秀传统文化因子，包括许多独属于我们民族的“非遗”，其形态本身具有由来已久的美，韵味独具。之中留存着或显或隐的线索，关乎我们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态度、情感表达方式、行为方式、思维模式、内在观念，也关乎人与人、人与家、人与集体等关系的链接方式，关乎我们在关键时刻的取舍，以及我们的审美取向、艺术创造等等。这让我们不只是皮肤和五官的特征与其他国家、民族的人不同，还有更多看不见的观念、精神的深层不同。正是这种不同，形成了我们国家、民族文化的特质。同时，有些东西又能超越地域、国度，让不同语言、不同地方的人领略到它的美。

在采风中发现，许多延续至今的传统习俗、仪式，是民间生活维持良性运转的重要动能，在今天依然有凝聚人心、提振精神的作用。比如我写过的“板凳龙”，2025年正月初七南昌县北洲村舞板凳龙活动，云集了一万多人。正月十三新建区石岗梅灯活动，现场有五六万人。千米长龙需要千人共同抬举，才能在大地上龙腾起来。还有南丰石邮村的傩舞，“搜傩”那晚，小小的傩神庙前聚集了数千人。这些民俗活动成为无形的凝聚之力，让整个村庄进入激情时刻，以欢乐、祈福为纽带，将现场的人们紧紧拥抱在一起。这样的时刻，对成人有情感连接的意义，对于孩子来说，更是一场很好的爱家、爱国、爱国主义教育，让他们了解自己文化的根脉何在。

儿童小说《会飞的板凳龙》写赣地舞板凳龙习俗，讲述香樟村四年一度的板凳龙盛会前后的团圆故事，展现传统民俗的独特风味与乡村发展现状。该作品入选中国作协2024年文学转化影视重点推荐十部作品名单，是唯一一部儿童文学作品，后签约改编成非遗电影，目前已在筹备中。2025年出版的《生命之树》融合非遗剪纸与生态保护主题，讲述三个喜欢剪纸的孩子抱团成长的故事，其中大量章节写到鄱阳湖、候鸟和重现赣江的江豚。还有一部中篇小说《瓷火》结合红色主题与非遗，走访了南昌瓷板画大师级人物，融合中国第一代飞行员的抗战经历与民国瓷板画历史，展现独特艺术魅力，传扬革命精神与爱国情怀。

《纸上万物浮现如初》是我的一部散文集，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不少篇目写赣地非遗。最早一篇文章落笔于2015年，断断续续写了十年，这是一本缓慢生长的书。这种缓慢，与时间的悠长相匹配，也与书中试图留存的“由来已久的美”相匹配。

最难忘的一次经历，是与朋友在南丰石邮村跟访傩班四天，傩班跳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，后写成《观傩记》。最长的一次跟访，是去南昌县采茶剧团跟访魏小妹老师，前后三年，采访多位老中青演员，现场看排演和下乡演出，这些都写进了《有一种美由来已久》，并衍生出长篇小说《对花》。

这类写作让我愈发深刻地认识到“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”的意义。生活中有丰富、鲜活、驳杂的素材，采风就是去与真实相遇、与陌生相遇、与意外相遇，所见所闻可能颠覆以往认知。这些亲历的真实体验、毛茸茸的感受、意味深长的时刻，都成为笔下作品中闪闪发亮的部分。

在采写过程中，我逐渐明晰两个原则——在场，关注人。“在场”原则推动我不断向外行走。去现场，获得第一手经验，看到旁人习以为常甚至视而不见的富有意味的细节。因为在“在场”，我捕捉到了不可能从他人作品里获得的体验，它们成为我的独特“发现”，通过书写被更多人了解。

再是关注“人”。任何技艺、任何文化，都是靠人创生、传承并创新。人是被选中的媒介，也是主动性的创造者，是灯盏相续的那一只只点灯、护灯的手，和一颗颗为之炽烈跳动的心。在采写中，我能感受到一个个饱满的灵魂、一个个有温度的生命倾情投入，他们的诚挚、专注、执拗，赋予了一项项“非遗”顽强的生命力。我写那些民间艺术家的遭遇、情感选择、关键时刻的取舍，他们中的很多人我愿意称之为民间艺术家，自觉或不自觉超越了“技”的层面，进入了属于“艺”的创造性境界。

一个人的写作之路，是环环相接又不断延展的。因写作有关“非遗”项目的散文，我多次前往铅山县实地采访，走遍河口镇残存老街与偏远村落。了解越深，越觉得这是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、有故事的地方，以之为背景写一部小说的念头，遂落土生根。为此我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，在历史和现实的缝隙处展开想象，构思出长篇小说《纸镇》。

目下，越来越多的人以“中国式叙事”，试图留住这些“由来已久的美”，这不仅仅包括文字的书写，也包括照片、视频等影像化的传播方式，还有各种文艺形式的表达。我觉得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我们需要写出关于这些“非遗”在特定经纬度的真实状态，以现代性的眼光，立足于现实生活语境，来打量、看待和书写这些文化遗产，写出其形态背后的精神传承、牵连的文化根脉，也写出它们的现实状况及未来发展、传承、创变的可能路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这类书写不只有文学价值，也有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。

“非遗”不只是一个社会热点要去关注，它也是我们应该长久关注和研究的一个文化课题、社会课题，是写作者值得去深挖的文学之“井”。只有越来越多人接力关注、书写“非遗”，加入到保护、传承、创新发展的队伍中，这些“由来已久的美”才有可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，长久地活态留存。

（作者系作家，江西南昌市作协主席）

淬火成诗，向光而生

——读袁静《生如夏花》诗集
李敬一

坚韧与人生的豁达融为一体。

“砺炼”卷，乃诗集的筋骨，见出生命的硬度。《熔鼎》中“正午的熔炉在倾泻钢水/树荫在烙印里蜷缩成盾”，以冶金为喻，写出逆境中的淬炼，暗合孟子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”的砥砺之道。《眷恋》写父母深情，“旧茶杯里卧着的春天/是药片融不开的语言”，于细微处见真情，没有悲愤的呼号，却将生死相隔的思念写得绵长动人，堪比元稹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的真挚，更具烟火人间的温情。

“寂”与“圆融”两卷，是生命的沉淀与升华。《褶皱的星空》追忆父亲，“父亲，您总在夏夜/把繁星/盛进我碗里/您笑着说/那是银色的谷粒”，质朴的细节中藏着最深的眷恋，如陶渊明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”的淡远，却更显绵长。《归鸟》中“羽翼开合，同频天地呼吸/澄明之境，无倦无终”，抵达了“物我两忘”的哲学境界，与庄子“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”的逍遥之境相呼应，展现出历经风雨后的通透与从容。

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传播者，我特别欣赏作者对汉语这一中国古典诗歌音乐性载体的把握。如《回乡偶书》采用词牌小令的节奏：“落叶秋风小径深/别离今生，不负今生”，既保持古典诗词的韵律美，又注入现代口语的鲜活感。这种“旧瓶装新酒”的创作实践，为汉语诗歌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
《生如夏花》诗集的独特价值，在于它成功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诗学宇宙。

五个章节既独立成篇又相互呼应，形成如《红楼梦》“草蛇灰线”般的隐秘关联。诗人通过“父亲一故土一星辰”等意象的反复变奏，编织出经纬交织的情感网络。这种宏大而精致的结构建构能力，在当代诗坛尤为难得。

整部诗集最可贵之处，在于“专业而不晦涩，深情而不矫情”。作者以扎实的文学功底，将山水风物、人生感悟、家国情怀熔于一炉，既引经据典而不露痕迹，又通俗晓畅仍不失韵味。没有刻意的辞藻堆砌，没有空洞的哲理说教，每一首诗都是发自肺腑的心声，每一个意象都是生命体验的凝结。正如泰戈尔“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”的哲思，作者更以自己的人生体验诠释了“夏花与秋叶之间，横亘着最坚韧的砺炼”，让此诗集有了超越个体命运的普世意义。

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这样一部沉潜着生命重量与情感温度的诗集，如同一束光，照亮了我们内心深处迷茫与坚守。它告诉我们，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从未经历风雨，而在于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向阳而生；诗歌的价值不在于辞藻的华丽，而在于能直抵人心、引发共鸣。

谨以此文，推荐这册饱含生命力量的诗集。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，汲取前行的力量，读懂生命的真谛——所谓生如夏花，终是在砺炼中扎根，在坚守中绽放，在沉淀中圆融。

（作者系文化学者，武汉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央视《百家讲坛》主讲人）